

“鹤嘴斧”的类型、年代与起源

张文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文章对于以往所谓的“鹤嘴斧”的类型、年代与起源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指出所谓的“鹤嘴斧”实际上包含了鹤嘴斧、双刃斧、双头锤、锤斧、双头啄、镐六种不同的器物, 应对其加以区分, 并给予不同命名。这些器物流行的年代不尽相同, 并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 而并非起源于某一地区单一的一种器物, 但它们之间的祖源关系可能存在着亲疏之别。

关键词: 鹤嘴斧; 类型; 年代; 起源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鹤嘴斧”是北方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早期的一些著述大多对此类器物有过著录^[1], 但标本出土地点不详。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在我国北方地区, “鹤嘴斧”在田野发掘中屡有发现, 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陆续出现了一些讨论文章^[2]。不过, 检索已有的成果发现, “鹤嘴斧”本身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有关其类型、起源等问题的认识, 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在此, 笔者仅就类型、年代和起源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1 类型

关于“鹤嘴斧”的类型问题, 过去, 研究者论述较多, 但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特别清晰。笔者认为, 所谓的“鹤嘴斧”实际上包含了多种不同种类的器物。根据形制差别, 可将中国境内的“鹤嘴斧”分为六类, 暂分别称为 A、B、C、D、E、F 型。

A 型 短釜或釜孔, 一端为扁刃, 一端呈鹤嘴状, 分二亚型:

Aa 型, 两端下垂或有夹角, 分五式:

I 式

以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公苏壕 M1: 1 为例^[3]。铜质, 两端下垂不甚明显, 扁刃一端, 刃部较厚, 刃口平直, 釜孔椭圆形(图一: 1)。通长 14, 刃宽约为 2 厘米(原报告中的刃宽数据有误——笔者注), 釜径 1.3 厘米。宁夏彭阳古城村征集的一件标本、彭阳于家庄 M19: 4^[4]、甘肃平凉崆峒山出土的标本^[5]等, 均属此式。

II 式 以内蒙古呼鲁斯太 M2: 1 为为例^[6]。铜质, 器体修长, 两端下垂不明显,

刃端与 I 式相近, 釜孔近圆形, 略外鼓(图一: 2)。通长 18.5 厘米, 刃宽 1.6 厘米。宁夏固原上台村芦子沟征集的一件标本^[7]、彭阳张街村 ZHJ: 03^[8]、中卫狼窝子坑 M5: 27^[9]、《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著录的一件标本^[10]、鄂尔多斯采集品 E. 243^[11]可归入此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鹤嘴斧^[12], 也可归入此式。

III 式

以内蒙古凉城毛庆沟 M38: 1 为例^[13]。铁质, 两端略下垂, 刃部薄而稍宽, 釜孔圆形, 外鼓明显(图一: 3)。通长 19.6 厘米, 刃宽 2.5 厘米。

IV 式

以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出土的一件标本(编号: 2264)为例^[14]。铁质, 两端下垂明显, 刃部薄而宽, 使用痕迹清楚, 釜孔圆形, 外鼓明显(图一: 4)。通长 23.5 厘米、刃宽 3 厘米。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出土的一件铁质标本 M1: 3^[15]、宁夏固原鸦儿沟发现的铜质标本^[16]、《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著录的一件^[17]可归入此式。

V 式

以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标本为例^[18]。铁质, 简报中对其形制特征及体量并未做详细的介绍。从简报提供的照片观察, 两端下垂较甚, 刃端宽大, 略呈扇形, 鹤嘴状一端, 较为粗大,

中部应有銎（图一：5）。器长及刃部相关数据不详。

Ab 型，两端平直，分三式：

I 式

以宁夏固原杨郎马庄 IM2：40 为例^[19]。刃端较厚，短管銎，銎孔圆形，略外鼓（图一：6）。通长 12.4 厘米，刃宽约 1.5 厘米。

II 式

以甘肃庆阳镇原县红岩出土的一件标本为例^[20]。刃端扁平，略窄，銎孔圆形，銎两侧外鼓明显（图一：7）。通长 12.6 厘米，刃宽 1.2 厘米。

III 式

以宁夏彭阳白草洼村 BCW：02 为例^[21]。刃端扁平，略宽，銎孔椭圆形，外鼓明显（图一：8）。通长 14 厘米，刃宽 1.8 厘米。

B 型 管銎或銎孔，两端均作扁刃状，如斧。分二亚型：

Ba 型 两端平直，分五式：

I 式

以彭阳白草洼村 BCW：03 为例^[22]。刃部较厚，刃口呈陡坡状。銎孔椭圆形，略外鼓（图一：9）。通长 9.1 厘米，刃宽不详。旧时在绥远征集的一件标本^[23]，宁夏彭阳郑庄征集的一件标本^[24]，固原马庄 IIM18：8^[25]，均可归入此式。

II 式

以桃红巴拉 M1：2 为例^[26]。刃部较 II 式略薄，刃口扁平，銎孔椭圆形，外鼓较 I 式略甚（图一：10）。通长 14.3 厘米，刃宽 1.6 厘米。

III 式

以甘肃镇原县庙渠村出土的一件标本为例^[27]。刃部略宽，刃口薄而锋利，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唯銎孔近圆形，两侧各铸有凸起的大角羊纹饰（图一：11）。通长 14.3 厘米，刃宽 1.5-1.8 厘米。

IV 式

以宁夏固原古城村征集的一件标本为例^[28]。形制与 III 式相近，两端似有残缺，刃部似较后者更薄（图一：12）。通长 14.5 厘米，刃一端宽 1.7 厘米，另一端 1.5 厘米。

V 式

以宁夏固原杨郎马庄 IM14：12 为例^[29]。刃部薄，銎孔圆形，外鼓更为明显，銎孔两侧表面各饰一斜十字形纹饰（图一：13）。通长 15.6 厘米，刃宽约 2.1 厘米。

Bb 型，两端略下垂，标本数量少，不分式。以陕西凤翔横水征集的一件标本为例^[30]。中有平脊，刃部较厚，刃口呈陡坡状。管銎，銎孔椭圆形，下部长出器身。銎管上端，两侧各有一小圆孔，銎面饰竖排双线勾联雷纹，下端一周索状纹。器身一面正中刻一“][”形符号（图一：14）。通长 14.4 厘米，刃宽 1.6 厘米。

C 型 銎孔，两端作圆柱或方棱状，顶端平，如锤。分三式：

I 式

以鄂尔多斯采集品 E. 244 为例^[31]。两端似作圆柱状，柱稍短，銎孔略呈椭圆形，外鼓不甚明显（图二：1）。通长 6.4 厘米。

II 式

以杨郎马庄 IM6：21 为例^[32]。形制与 I 式基本相同，柱稍细长，銎孔圆形，略外鼓（图二：2）。通长 7 厘米。旧时在绥远采集的一件残器^[33]，似亦属此式。

III 式

以鄂尔多斯采集品 E?242 为例^[34]。两端均作方棱状，略下锤，柱修长，銎孔椭圆形，外鼓明显（图二：3）。通长 15.5 厘米。

D 型 管銎，一端有扁刃，一端顶部平齐，如锤。分二亚型：

Da 型，一端有刃，一端作方棱状。以陕西扶风县庄白伯冬墓中出土的标本为例^[35]。有刃一端短而略显钝厚，似系残后打磨新刃所致，另一端稍长，愈向外尾端愈厚实，尾端呈微向外凸的锤面。管釜，釜孔椭圆形，上端略残，下端长出器身，饰索状纹。管釜及器表饰鳞纹，尾端增饰云纹一朵（图二：4）。通长 16.8，刃宽 3.3 厘米。

Db 型，一端有扁刃，另一端呈圆柱状。仅在鄂尔多斯征集过一件，编号 E. 246^[36]。据报道者提供的线图和图版观察，圆柱状顶端平圆，系一锤面，另一端有宽大刀口。管釜，截面呈圆形，上、下两端均长出斧身，釜部上端饰三道凸线纹（图二：5）。通长 10.4 厘米。

E 型

釜孔，两端均呈鹤嘴状。在宁夏彭阳范麻村曾发现一件，编号 XM: 04^[37]。两端平直，釜孔呈椭圆形（图二：6）。通长 10 厘米。

F 型

短釜，两端均作扁刃状，两刃线呈正相交。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石椁墓 M101: 13^[38]，即属此型。短釜，略呈长方形，两侧有对称的小钉孔（图二：7）。通长 15.5 厘米。

上述诸型器物，形制差别明显。C、D、E、F 型器物，因标本太少，演变序列不甚清晰，而标本较多的 A、B 型器，呈现出基本相同的演变规律：1）器体由短变长；2）釜孔外鼓由不明显变得明显；3）有刃一端，刃部由窄变宽，由厚变薄，说明它们有各自独立的演变序列。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不同类型器物共存于同一单位，但在宁夏固原马庄墓地，发现 Ab 型 I 式，Ba 型 V 式，C 型 II 式标本共存于墓地第一地点的现象，因此，它们应属于不同类型的器物，将其视为同一类型器物是不合适的。

鹤嘴斧曾有过“鹤嘴锄”、“鹤嘴镐”、“铁斗斧”等不同的叫法。按照过去的一种说法，鹤嘴斧是指北方系青铜器当中一种一端稍尖、另一端为扁刃，中间有圆形或椭圆形釜孔的器物，因稍尖的一端在形态上与鹤嘴相仿，故而得名。如果就中国境内 A 型器而言，这一说法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若从更大范围来看，这一提法并不全面。在中亚乃至更西面的地区，发现有另外一类铜（铁）器^[39]（图三：22、23.），其基本形制特征是，有釜、一端扁刃，一端呈鹤嘴状，在这一点上与“鹤嘴斧”并没有区别，但此类器物扁刃的刃线与器柄基本呈正相交，而鹤嘴斧扁刃的刃线与器柄相互平行，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同，所以，严格来讲，对于鹤嘴斧特征的界定，还应该加上一条，即刃线与器柄相平行，这样，才不至于将鹤嘴斧与中亚等地发现的那类器物相混淆。由此，可将鹤嘴斧的特征概括如下：

一端稍尖、另一端为扁刃；

中间有短釜或釜孔；

刃线与器柄相平行。

既然以往所谓“鹤嘴斧”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器物，B、C、D、E、F 诸型器物，又均缺少这一特征，当不宜再以“鹤嘴斧”相称，“鹤嘴斧”作为一个统一的名称已经不大合适。鉴于此，可依次将 B、C、D、E、F 诸型器物分别称为“双刃斧”、“双头锤”、“锤斧”、“双头啄”和“镐”，A 型器因符合“鹤嘴斧”的特征，可沿用旧称。

2 年代

在“鹤嘴斧”标本中，有不少是零星的征集品，出土单位明确的标本数量不多，且情况也不尽相同。一种是标本系发掘所得，出土单位明确，共存遗物相对清楚的，计有宁夏马庄墓地 IM2、IM6、IM14、IIM18，内蒙古桃红巴拉 M1，公苏壕 M1、毛庆沟 M38，饮牛沟 M1、呼鲁斯太 M2 等出土的标本；一种是标本据称出自墓葬，但系征集所得，且有共存遗物的，计有宁夏彭阳张街、米塬村、范麻村、甘肃庆阳庙渠、红岩、内蒙古玉隆太等出土的标本；一种情况标本虽系墓葬出土，但共存遗物未做详细报道（如西岔沟出土的标本）、或因其他原因混淆不清（如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 M5）。就对年代推定而言，属于前两种情况的材料无疑是最为可靠的。下面我们主要依据属于上述二种情况的诸标本，并结合上面的型式分析，对“鹤嘴斧”年代做些推测。

在上述诸型器物之中,以 A 型、B 型器标本数量最多,演变序列也较为清楚,在此,将着重讨论 A 型、B 型器物的年代。

Aa 型器中,出自墓葬的标本较多,如 Aa 型 I 式的公苏壕 M1: 1、II 式的呼鲁斯太 M2: 1、III 式的毛庆沟 M38: 1、IV 式的玉隆太 2264、饮牛沟 M1: 3。在公苏壕 M1: 1、毛庆沟 M38: 1、饮牛沟 M1: 3 的共存遗物中,均发现有短剑。公苏壕 M1 出土短剑系典型的“触角式短剑”,毛庆沟 M38 出土短剑为扁环形首,饮牛沟 M1 出土短剑则为一字形首。根据有关短剑研究的成果^[40],三者之间应存在着自早到晚的演变关系。另外,I 式到 V 式,铁质标本的增多,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一种早晚关系。

Aa 型器中,公苏壕 M1 出土 I 式器,有人将 I 式器的年代断在春秋晚期^[41],应该是可信的。III 式器的年代,有人断在战国晚期^[42],IV 式器,原报告将其年代也断在战国晚期^[43]。III 式器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将属于 III 式的标本 M38: 1 与属于 IV 式的标本 2264 的形制视为一致。对比两件标本可以看出,M38: 1 与标本 2264 的形制差别是明显的,前者两端下垂程度小于后者,前者通长、刃宽也均小于后者。根据我们对 Aa 型演变规律的认识,标本 M38: 1 应早于标本 2264。与标本 2264 共存的一件车辖,至晚在战国晚期仍在用,据此,大体可将标本 2264 的年代断在战国晚期,原报告的断代可信。这样,将 III 式器的年代,断在战国中期似更妥当些,由此,可将 II 式器的年代推定在战国早期。II 式器的年代偏早,还可以从其共存遗物中的铜扣、圆管状饰与桃红巴拉墓地 M1 同类器物的相似之中得到印证。V 式器,原报告将其年代断在西汉时期^[44]。因此器共存遗物不详,对于上述推断无从印证,从形态上看,此器显然较 IV 式器晚,年代不应早于战国晚期。

红岩村墓葬出土 Ab 型 II 式器。根据红岩村墓葬出土的一件铜戈来看,可将红岩村墓葬年代断在战国早期,这样,Ab 型 I 式器的马庄 IM2: 40 的年代下限不应晚于这个时期。对于此器的具体年代,本文更倾向于断在春秋中期或更早,理由如下:

1) Ab 型 I 式、II 式器形制差别较大,有明显的缺环,两者在年代上应该存在不小的差距。2) 与马庄 IM2: 40 的共存遗物中,有一件双耳陶罐 IM2: 24^[45],加砂红褐陶,大口,平沿、平底,颈部有两道平行的凸棱,形制与 1986 年在沙井文化的甘肃金昌三角城遗址采集的一件双耳罐残器(86 采)相同。沙井文化文化的下限,有学者认为,不晚于春秋晚期^[46],若此说成立,则马庄 IM2 的双耳陶罐年代也应不晚于春秋晚期。共存遗物中,另有一件铁刀^[47],直背,弧刃,柄、身分界明显,形态显然较公苏壕 M1 出土的铜刀早,这样,铁刀的年代应早于春秋晚期。

Ab 型 III 式器形制与 Ab 型 II 式器形态接近,年代应相距不远,参照后者,可将前者的年代断在战国中期。

属于 Ba 型 II 式器的桃红巴拉 M1: 2,有研究者将其年代断在春秋晚期^[48]。桃红巴拉 M1 发表的共存遗物不少,计有单耳陶罐、铜马面饰、S 形饰牌、云纹饰牌、长方形管状饰、圆管状饰、连珠状饰、兽头饰、铜刷柄、锥等,但可作为明确断代标尺的器物不多。不过,桃红巴拉墓地 M1 出土的木质标本,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 2615 ± 105 和 2540 ± 105 ,即公元前 665 ± 105 和 590 ± 105 年,相当于春秋晚期。参照这一数据,将 M1 的年代断在春秋晚期,基本还是可信的。若此,则 I 式器的年代当在春秋中期。属于 Ba 型 III 式的庙渠器的共存遗物与红岩村出土的 Ab 型 II 式器的共存遗物相似之处甚多,均有铜刀、带扣、车,圆管状饰、铜泡和花式铜泡,形制也比较接近,两者的年代应大体相当,庙渠器的年代也当在战国早期。属于 IV 式的彭阳古城村标本系征集品、属于 V 式的马庄 IM14: 12,虽有共存遗物发表,与其他标本共存遗物可比性不强,根据庙渠器的年代,结合式别变化,可暂将 IV 式、V 式器的年代分别推定在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49]。

属于 Bb 型的风翔器,原简报根据器体的花纹将其年代断在春秋早期,可从。另,其釜管下端的索状纹也见于 Da 型器釜管之上,可作为其年代偏早的另一个证据。

C 型器中,属于 II 式的马庄 IM6: 21 出自墓葬。报告发表的与之共存的器物仅见铜器,计有铜刀、凿、锥、泡等器物,以铜刀、铜凿的年代特征较为明显。铜刀 IM6: 20^[50],凹背,

弧刃，柄背较厚，背至刃逐渐变薄，刃、柄分界不甚明显，柄端有一圆形小孔，形制与红岩村的有孔铜刀相似。铜凿 IM6: 27^[51]，体呈长方形，弧刃残，上有三角形钉孔，形制与庙渠出土的铜凿相似^[52]。由此，大体可将Ⅱ式器的年代推定至战国早期。这样，Ⅰ式的年代大约应在春秋晚期。从形制上看，Ⅲ式与Ⅱ式之间似有缺环，且体形细长，多晚期的特征，其年代或许可晚至战国中期以后。

Da 型器的年代，原简报根据共生器物以及标本上的纹饰，将其年代断在西周穆王时期，可从^[53]。Db 型器的年代，原简报倾向认为于断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有人认为不晚于西周中晚期^[54]，也有人“估计出现在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的可能性较大”^[55]。后说可从。

E 型器中的茆麻村标本，共出遗物包括有铜短剑、矛、铤、镞、圆形管状饰等铜器。根据杨建华先生的研究，这批材料的年代大体在春秋之际到战国早期^[56]。

F 型器，原报告断在西周末春秋初，可从^[57]。

根据上述的分析，Aa 型器的流行年代大致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至西汉时期，

Ab 型器的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Ba 型器的流行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Bb 型器的出现应不晚于春秋早期；C 型器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D、E、F 型器的标本太少，其流行年代不是特别清楚，但 Da 型器出现的年代不应晚于西周早期、Db 型器的出现不应晚于春秋早期，E 型器出现的年代不应晚于战国早期，F 型器出现的年代不应晚于春秋早期。显然，A、B、C 型器，基本上是并行发展的，年代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Aa 型器甚至可下延到了汉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本文对“鹤嘴锄”所做的类型划分。

3 起源

关于“鹤嘴斧”的起源，过去，研究者们曾做过一些推测，但大多是以将“鹤嘴斧”看作同一类器物为前提的^[58]。如前所述，“鹤嘴斧”实际上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器物，因此，分别追溯它们的起源要较笼统地讲“鹤嘴斧”的起源更为合理些。

3.1 鹤嘴斧

从分布上看，我国北方长城地带是鹤嘴斧分布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其中可能存在着东、西两个不同的亚区，前者以内蒙地区为中心，流行 Aa 型器，后者则以宁夏地区为中心，多见 Ab 型器。这反映出我国境内的鹤嘴斧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Aa 型器、Ab 型器均有比较清晰的演变序列，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早晚演变关系。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一个源头。虽然在蒙古的乌兰古木（图三：1）^[59]、图瓦（图三：2、4.）^[60]、西伯利亚（图三：3）^[61]，高加索（图三：5）^[62]，也发现有鹤嘴斧。其中，既有与 Aa 型器形制相近者，也有与 Ab 型器形制相近者。但从形态上看，这些标本年代偏晚，所以，鹤嘴斧可能起源于我国的北方地区。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鹤嘴斧”的形成，至少吸收了“棍棒头”和管釜斧两种器物的形式。若仅就“鹤嘴斧”的扁刃一端的形状而言，“鹤嘴斧”与管釜斧确有相似之处，不过，若就“鹤嘴状”一端的形状而言，无论是“棍棒头”，还是管釜斧，均缺少“鹤嘴状”的特征，这一特征的渊源，上述观点并没有说得太清楚。

多年前，林沅先生曾指出，北方系青铜器中与管釜战斧同时存在的管釜啄，是后来北方系青铜器中的“鹤嘴锄”的前身。而前者在伊朗有断为前 2300—前 2100 年者，可知出现年代甚早^[63]。这一认识为“鹤嘴斧”的“鹤嘴状”的特征找到了更早的源头，是很有说服力的。

这里需要做两点说明。一是，根据上文对鹤嘴斧型式分析，目前所见最早的标本，年代可能属于春秋中期，其与管釜啄之间尚存在较长的时间缺环。二是，鹤嘴斧的形制是一端呈鹤嘴状，另一端系扁刃，其形制在继承了管釜啄“鹤嘴”特征的同时，可能还吸收了斧属器的“扁刃”因素。在北方系铜器分布区，至晚在商末，就流行管釜斧，因此，有理由认为，鹤嘴斧实际上是在融合了啄与斧属器两者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并非早于它的某种单一器物的自然演变。鹤嘴斧在它后来的演变中可能还曾有过分化，两个亚型当是这种分化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鹤嘴斧的产生似乎并未妨碍铜啄和管釜斧各自的发展。在更晚的时期,在塔加尔文化(图三:24)^[64]、蒙古的图瓦地区(图三:25)^[65]、阿尔泰地区(图三:26)^[66],铜啄依然甚为流行。在我国甘肃秦安城关公社^[67]、云南晋宁石寨山^[68]也发现有类似的铜啄。而管釜斧直到战国早期,在我国还有发现^[69]。

不过,鹤嘴斧的产生,可能对其他一些器物产生了影响。在塔加尔文化中,有一种器物,一端呈鹤嘴状,一端为圆锤状,长管釜,有人称为“战斧”,认为其与鹤嘴斧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70]。在较晚的阶段,此类器物形制开始发生了变化,圆锤状一端逐渐出现了刃^[71](图三:27、28),这种变化可能与鹤嘴斧的影响有关。

3.2 双刃斧

在我国,双刃斧分布地域相对较为集中,主要见于西部的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地区,尤以甘宁地区最为多见,年代上有可早到春秋早期的标本。其中,Ba型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演变序列。尽管在蒙古的乌兰古木(图三:6)^[72],图瓦(图三:7)^[73]、高加索(图三:8、10)^[74]以及中欧地区(图三:9)^[75],也发现有类似的标本,但形态上也多具偏晚阶段的特征,而且铁质标本较多,年代似不及我国境内标本早,因此,双刃斧可能是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至于此类器物的祖型究竟为何物,目前还不大能说得清楚,或许是该地区春秋早期前后新出现的一种器物。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辽东地区发现的一种双刃石斧,如辽宁海城二轻山,发现有一件石斧^[76](图四:23),两端作扁刃状,中有釜,釜的两侧呈隆起的钝尖,形制与Ba型斧略近,但此类石斧与双刃斧分布区域相距甚远,中间缺环甚多,两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3.3 双头锤

在我国,双头锤标本出土相对较少,目前仅见于内蒙古中部地区、宁夏地区。在蒙古的图瓦地区(图三:11)^[77],也发现有类似的器物,但数量似也不多。

在铜质双头锤诸标本中,以本文所分的C型I式的年代为最早,约在春秋晚期。与之形制相似的石质器物,在我国北方地区有较多的发现。在青海化隆上半主洼墓地^[78]、大华中庄墓地^[79]、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中^[80],均见有此类器物(图四:20-22)。其中以上半主洼墓地出土的双头锤年代最早,从共存陶器看,年代大体在西周早期前后,明显较铜质双头锤早。同时,此类石质双头锤分布范围与铜质双头锤也大体一致,均集中在我国北方长城地带,只是前者分布范围较后者更大,向西已达青海东部地区,向东更远至北京昌平地区。由此推测铜质双头锤应该是源于中国的,可能与石质双头锤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若此,则将来在青海东部地区以及内蒙古中部以东面地区发现此类器物是可以期待的,尽管目前在这些区域,尚不曾有关于此类器物的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在东欧草原地带曾零星地发现一种铜器,两端系锤,中有圆釜,形制与双头锤相似。据称,此类器物,有的年代可早到公元前4千年(图三:12、13)^[81]。但这种铜器与双头锤的分布区相距甚远,年代上的缺环也较大,两者之间不大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3.4 锤斧、双头啄和镐

在我国境内,此三类器物的标本数量比较少,各自均难以形成较为清晰的演变序列,从这一意义上讲,探讨其起源的条件并不具备,故在此,我们仅就可能的线索做一些推测。

锤斧在我国境内所见标本数量少,仅见于内蒙古和陕西,分布的中心区域偏西,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在高加索(图三:14-16)^[82]、中欧^[83](图三:17)等地区,发现有类似器物,数量较多,多为铁制品,其中有年代可早到公元前7世纪者,从器物形态上看,这些标本也较中国境内的锤斧晚。但考虑到此类器物在境外发现较多,在目前情况下,似不宜过早地断言锤斧的源头究竟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境外去寻找。不过,就现有材料而言,此类器物起源于西面倒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它的祖型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在锤斧诸标本中,以庄白器的年代最早。很多年前,安志敏先生曾对该器有过专门的讨论,并将此器与鹤嘴斧等同起来,同时指出,它与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的石制锤斧有着

密切的关系,其起源和使用与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84]。这一认识是值得研究的。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虽然锤斧与鹤嘴斧在我国北方地区均有发现,但却是两类不同的器物。至于说到它的起源与使用与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证据列举的相似之物,形制差别之大似需做进一步的区分。

石质锤斧是我国北方地区较为常见的器物,在我国中原地区和境外,也多有发现,并“有孔石锤斧”^[85]等不同的叫法。考察这些石质锤斧,发现它们在形制上存在明显差异,至少可区分为五类,据其形制特点,可分别称做“平顶锤斧”、“凸顶锤斧”、“双头石锤”、“石锄”、“双刃石斧”。其中,“平顶锤斧”的分布最为广泛,在我国境内从新疆到黑龙江的广大区域内的诸多地点,如我国新疆奇台半截沟^[86]、甘肃临洮寺洼山^[87]、陕西绥德薛家渠^[88]、河北围场张家湾^[89]、前石碑^[90]、内蒙古赤峰红山^[91]、黑龙江新巴尔左虎旗好勒巴诺尔^[92],均有发现此类器物(图四:3-8),在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还发现有铜质标本(图四:9、10)^[93]。此类器物在西亚苏萨^[94]等遗址,也有发现(图四:1、2)。“凸顶锤斧”的分布更多地见于我国的北方地区,在甘肃岷县山那^[95]、河北龙关^[96]、河南安阳殷墟^[97],均发现有此类器物(图四:11-13),在洛阳小屯^[98]及传世品^[99]中,还发现此类器物的铜质标本(图四:14、15)。“双头石锤”,如前所述,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图四:20-22),也有铜质标本(图二:1-3)。“石锄”似多见于河北地区,如在围场石匣^[100]、隆化哈巴气^[101]、尹家营^[102]等地,均发现此类器物(图四:16-18),也见有铜质标本^[103](图四:19)。“双刃石斧”似多见于辽东地区^[104]。不难看出,第一、二、三类器物,分布广泛,年代跨度长,有各自独立的演变序列,另二类器物似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除“双刃石斧”外,其他几类器物,均发现有相应的铜质标本,所以,过去所谓的“石锤斧”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类型的器物,笼统地讲,庄白器所代表的一类铜器与石质锤斧有密切关系,并不确切。

双头啄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标本非常少,目前,仅见于宁夏地区,年代可早到战国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器物常见于蒙古的乌兰古木^[105]、阿尔泰地区^[106](图三:18)以及俄罗斯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图三:19-21)^[107],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中,尤为流行而且,双头啄形制变化也比较多,有长鋤的、短鋤的,也有鋤孔的,有两端平直的,也有两端下垂的,有与宁夏所见标本完全相同的,也有不见于宁夏的,所以,此类器物的源头可能应该到森林草原地带去寻找,而不应是中国的北方地区。

从形制上看,双头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两端均呈鹤嘴状,功能应该主要是啄击,其起源当与年代更早的铜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是铜啄发展中的另一种变异形态。在诸型器物中,双头啄与鹤嘴斧形制最为接近,均有一端稍尖,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可能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

铜镐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标本数量也不多。关于此类器物的起源,目前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我们注意到,在西亚地区发现有一种器物(图三:29),年代有断在前11世纪者^[108],其基本形制是,两端均呈扁刃状,中央有鋤,两端刃线大体呈正相交,形制与南山根标本存在相似之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因标本数量过少,目前还无法断言。

从以上分析来看,诸型器物有着各自不同的渊源。其中,A型可能是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是吸收了铜啄和管鋤斧的某些因素而产生的。B型器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陕甘宁地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其祖型目前尚无法说得太清楚。C型可能与西北地区同类石质器物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E型器的起源应该到米努辛斯克盆地去寻找。F型器的产生目前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鹤嘴斧与双头啄在渊源关系上似表现得更密切些,与其他诸型器物在渊源上似乎更疏远些。两者或许有着共同的祖型。

综合以上分析,将本文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 以往所谓的“鹤嘴斧”实际上包含了鹤嘴斧、双刃斧、双头锤、锤斧、双头啄、镐六种不同的器物,这些器物形制存在明显差别,应对其加以区分,并给予不同名称,而不再用一个笼统的名称去包容它们。

(2) 六种器物的流行年代是不完全相同的。D 型器的年代, 整体偏早, 大体在西周时期, A、B、C 器的年代基本上是同时的, 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 A 器的下限可能更晚。E 型器流行的年代, 根据境外的材料来看, 与 A、B、C 器的年代可能也是相当的。F 型因标本太少, 其流行年代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3) 六种器物可能有着各自不同的起源, 而并非起源于某一地区单一的一种器物, 但它们之间的祖源关系可能又存在着亲疏之别。

附记: 本文是在导师林沅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之下完成的。文中所引俄文材料亦由林先生提供, 初稿完成后, 承蒙林先生审阅并慷慨赐教, 后经断断续续一年多的增补修改, 遂做成现在的模样。在此谨向林先生致以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

[1] 参见:

1. A. Andersson . Hunting Magic in Animal Style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2. (4): PP221-315. PL. X : 8

2.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 内蒙古长城地带(日)[M]. 1935. 3. Bernhard Karlgren.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 1945. (17): PP101-144. PL. 35: 201.

[2] 参见:

安志敏. 西周的两件异形铜兵[A], 文物集刊(2)[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51-158.

田广金、郭素新.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3-402.

陈振中. 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于建华. 鹤嘴铜斧初论[J]. 北方文物, 1996, (4): 22-28.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1. 1-122 页.

乌恩. 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 考古学报, 2002 (4): 437-464.

后文所引相关各家看法, 均出于此, 不再另作说明.

[3] 田广金、郭素新. 桃红巴拉墓群[J].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03-219. 210, 图五: 10.

[4] 参见:

罗丰, 韩孔乐. 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0 (5): 403-418. 406, 图三: 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J]. 考古学报, 1995 (1): 79-106. 88. 图十一: 12.

[5] 陈振中. 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174, 图三五: 7.

[6] 塔拉等. 呼鲁斯太匈奴墓[J].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3-226. 224, 图 4. 另, 文物. 1980 (7): 11-13. 图版四: 6.

[7] 罗丰, 韩孔乐. 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0 (5): 403-418. 406, 图三: 1.

[8] 杨宁国, 祁悦章. 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9 (12): 28-37. 30, 图二: 3.

[9] 周兴华. 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J]. 考古, 1989 (11): 971-980. 974, 图四: 9.

[10]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 内蒙古?长城地带(日)[M]. 1935. 图十二.

[11] 田广金, 郭素新.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45, 图二十三: 1.

[12] 东京国立博物馆. 大草原的骑马民族(日)[M]. 东京: 东京国立博物馆, 1997. 75, 图版 130.

[1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毛庆沟墓地[J].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7-315. 262, 图三十三: 5.

[14] 内蒙古博物馆等.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J]. 考古, 1977 (2): 111-114. 112, 图二: 11.

- [1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4 (3): 26-32. 29, 图七: 4.
- [16]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青铜器全集 (15)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5. 1-176. 47, 图版六十二.
- [17]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 内蒙古长城地带 (日) [M], 1935 年. 图十一: 1.
- [18] 孙守道. “匈奴西岔沟”古墓群的发现[J]. 文物, 1960 (8、9): 25-32. 27, 图八: 下. 原报告称“铁斗斧”.
- [19]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13-52. 29, 图十六: 14.
- [20] 许得楨、许进臣. 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的清理[J]. 考古, 1988 (5): 413-424. 418, 图十: 10 .
- [21] 杨宁国 祁悦章. 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9 (12): 28-37. 34, 图五: 8.
- [22] 杨宁国 祁悦章. 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9 (12): 28-37. 34, 图五: 1.
- [23]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 内蒙古长城地带 (日) [M]. 1935. 图十一: 3.
- [24] 杨宁国 祁悦章. 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9 (12): 28-37. 36, 图七: 8.
- [2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13-52. 29, 图十六: 10.
- [26] 田广金、郭素新. 桃红巴拉墓群[J].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03-219. 图版三九: 2. 原报告称, 此器一端扁刃, 一端呈鹤嘴状, 中有椭圆形釜. 据图版三九: 2 观察, 所谓的鹤嘴状一端, 实作扁刃状, 可能因长期使用、磨损使得前端略显尖圆, 从而导致报道者误以为其作鹤嘴状.
- [27] 许得楨、许进臣. 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的清理[J]. 考古, 1988 (5): 413-424. 417 页, 图八: 5. 原报告称“镐”.
- [28] 罗丰, 韩孔乐. 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0 (5): 403-418 . 406, 图三: 3.
- [29]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13-52. 29, 图十六: 15.
- [30] 赵丛苍. 陕西凤翔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器窖藏[J]. 考古, 1986 (4): 337-343. 339, 图二: 10. 341, 图五: 7.
- [31] 田广金、郭素新.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45 页, 图二三: 4.
- [3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13-52. 29, 图十六: 11.
- [33]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 内蒙古?长城地带 (日) [M]. 1935. 图十一: 2.
- [34] 田广金、郭素新.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45 页, 图二三: 2.
- [35] [53] 罗西章等. 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冬诸器[J]. 文物, 1976 (6): 51-60. 53, 图七、图八.
- [36] 同[34]. 图二三: 3.
- [37] 杨宁国 祁悦章. 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9 (12): 28-37. 33, 图四: 2.
- [38] [57] 辽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队等.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棒墓[J]. 考古学报, 1973 (2): 27-38. 图版八: 10. 原报告称为“镐”.
- [39] A. 卢立 A 扎德纳普罗 伍斯基. 费尔干纳的彩陶文化[J]. 新疆文物, 1998 (1): 107-112. 111, 图二: 14. B. Amihai Mazar. 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the Bible[M]. Cambridge: the Lutterworth Press, 1993. PP1-574. P360, Fig. 8: 32.
- [40] [56]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1. 1-122.
- [41] [48] 田广金、郭素新. 桃红巴拉墓群[J].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03-219.
- [42] 内蒙文物工作队. 毛庆沟墓地[J].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227-315 .
- [43] 内蒙古博物馆等. 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J]. 考古, 1977 (2): 111-114.
- [44] 同 18.
- [4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 1993 (1): 13-52. 48, 图二十

八: 2.

[46]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J].《国学研究》(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7]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考古学报,1993(1):13-52.43,图二十五:13.

[49]关于V式器IM14:12的年代,原报告定在战国晚期,依据是该墓出土的葫芦形圆牌与圆环相结合的带扣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AIII式带扣及西沟畔、玉隆太战国晚期同类器物相近。查原报告线图及墓葬登记表,IM14出土带扣系报告所分F型带扣,编号IM14:15,不出葫芦形圆牌与圆环相结合的带扣,葫芦形圆牌与圆环相结合的带扣实出自IIM14,系报告所分B型带扣,编号IIM14:19。又,根据原报告线图(29页),编号IM14:12系报告所谓的“鹤嘴斧”,可归入Ba型V式,但据墓葬登记表,IM14不出“鹤嘴斧”,出“鹤嘴斧”者系IIM14,IM14:12的准确出处有待确认,故仅根据原报告无法断定IM14:12的年代。

[50]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J].考古学报,1993(1):13-52.29,图一六:9.

[51]同50 图一六:19.

[52]许得楨、许进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的清理[J].考古,1988(5):413-424.417,图八:12.

[54]于建华.鹤嘴铜斧初论[J].北方文物,1996,(4):22-28.

[55]朱永刚.中国北方的管釜斧[J].中原文物,2003(2):30-44.34,图二:13.

[58]过去,对于“鹤嘴斧”起源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田广金等认为,“鹤嘴斧”是春秋晚期新出现的一种独具特征的工具。他们在注意到此类器物与卡拉苏克文化同类器物之间的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倾向于认为此类器物是起源于鄂尔多斯的。陈振中则将“鹤嘴斧”的起源与北方地区殷周乃至更早的石锄(即过去考古学家所称的石“锤斧”)联系在一起,认为前者是石锄在冶铜术发展和农业的进步条件下演化的一种产物。于建华则认为“鹤嘴斧”的形成至少吸收了两种器物形式??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棍棒头和使用于商末周初的管釜铜斧。乌恩认为,我国北方的“鹤嘴斧”同图瓦、阿尔泰及蒙古的战斧接近,其祖型可以在中国北方寻觅,其前身应该是自商代晚期开始流行的啄锤。诸说出处,参见注释2。

[59]诺夫戈罗德娃.古代蒙古(俄)[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298,图11.

[60]参见A.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1-122.122,图十九:16. B.莫什科娃主编.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亚洲地区的草原地带[M].1992.424.图七十四:1.

[61]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长城地带(日)[M].1935.图十三:3.

[62]周纬.亚洲古代兵器图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图一零八:15.

[63]林沅.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A].林?学术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64]马尔特诺夫.森林草原的塔加尔文化(俄)[M].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科学分院科学出版社,1979.197,图四十四:38.

[65]莫什科娃主编.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亚洲地区的草原地带(俄)[M].1992.424,图七十四:3.

[66]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考古学报,2002(4):437-464.451,图十四:4.

[67]秦安县文化馆.秦安县历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J].文物,1986(2):40-43.40,图一:9、10.

[68]张增祺.晋宁石寨山[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69,图47.

[69]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墓清理简报[J].考古,1987(9):773-777.

[70]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考古学报,2002(4):437-464.

[71]参见A.马尔特诺夫.森林草原的塔加尔文化(俄)[M].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科学分院科学出版社,1979.162,图十:1. B.莫什科娃主编.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亚洲地区的草原地带(俄)[M].1992.413页,图六十三:1.

[72]诺夫戈罗德娃.古代蒙古(俄)[M],莫斯科: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297页,图10.

[73]莫什科娃主编.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亚洲地区的草原地带(俄)[M].1992.424,图七十四:

2.

[74] A. 周纬. 亚洲古代兵器图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图一零八: 13. B. 缅柳科娃主编.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欧洲部分草原(俄)[M]. 莫斯科: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407, 图一零二: 10.

[75] 缅柳科娃主编.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欧洲部分草原(俄)[M]. 莫斯科: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333, 图二十八: 25.

[76] [104] 王增新. 辽宁海城二轻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J]. 考古通讯, 1958(1): 53-54. 53, 图一.

[77] 莫什科娃主编.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亚洲地区的草原地带(俄)[M]. 1992. 422, 图七十二: 65.

[78]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青海化隆县半主洼卡约文化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 1996(8): 27-44. 36, 图二〇: 4.

[79] 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等. 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5(5): 11-34. 23, 图十八: 7.

[80]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J]. 考古, 1976(4): 246-258. 254, 图十三: 8. 图版四: 15.

[81] E. N.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324. P87. Fig. 28: 22. P45. Fig. 13: 15.

[82] 参见 A. 缅柳科娃主编.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欧洲部分草原(俄)[M]. 莫斯科: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395, 图九十: 3. B. 同 A. 337, 图三十二: 20. C. 伊里英斯卡娅等. 斯基泰人(公元前7-4世纪)(俄)[M]. 基辅, 1983. 30, 图15.

[83] 缅柳科娃主编. 斯基泰-萨尔马特时代的苏联欧洲部分草原(俄)[M]. 莫斯科: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333页, 图二十八: 19.

[84] 安志敏. 西周的两件异形铜兵[A]. 文物集刊(2)[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51-158.

[85] 郑绍宗. 有孔石锤斧之研究[A].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272-284.

[8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 奇台县半截沟新石器时代遗址[A].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C].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43, 图一: 4.

[87] 南玉泉. 辛店文化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A]. 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73-107. 106, 图十五: 2.

[88]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等. 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J]. 文物, 1988(6): 28-37. 35, 图十四: 8.

[89] 郑绍宗. 有孔石锤斧之研究[A].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272-284. 274, 图一: 7.

[90] 同 89, 275, 图二: 8.

[91] 同 84, 参见注释 38.

[92] 盖山林. 黑龙江新巴尔虎左旗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 1972(4): 20-23. 22, 图三.

[93] 项春松, 李义. 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J]. 文物, 1995(5): 4-22. 14, 图十六: 12. 13, 图十四: 1.

[94] 周纬. 亚洲古代兵器图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图八十四: 17; 图八十五: 3.

[95] 杨益民. 甘肃岷县山那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3(5): 20-23. 21, 图二: 8.

[96] 同 84, 参见注释 47.

[97] 李济. 殷墟有刃石器图说[A].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444, 图十八: 10a.

[9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西郊四号墓发掘简报[A]. 文物资料丛刊(9)[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141-150. 144, 图四: 5.

[99] A. Andersson. Hunting Magic in Animal Style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2. (4): PP221-315. PL.X : 7.

[100]同[89], 277 页. 图四: 1.

[101]同[89], 277 页. 图四: 5.

[102]同[89], 278 页. 图五: 4.

[103]辽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队等.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J]. 考古学报, 1973 (2): 27-38. 图版八: 9. 原报告称为“锄”.

[105]诺夫戈罗德娃. 古代蒙古(俄)[M]. 莫斯科: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263 页, 图三.

[106]乌恩. 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J]. 考古学报, 2002 (4): 437-464. 451, 图十四: 7.

[107]C. B. 吉谢列夫.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M]. 乌鲁木齐: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1. 216, 图二十四: 4、8、10.

[108]Amihai Mazar. 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the Bible[M]. Cambridge: the Lutterworth Press, 1993. P359. Fig. 8: 31.

On the Type, Date and Origin of the Bronze Crane-mouth Axe in Northern China

Zhang wen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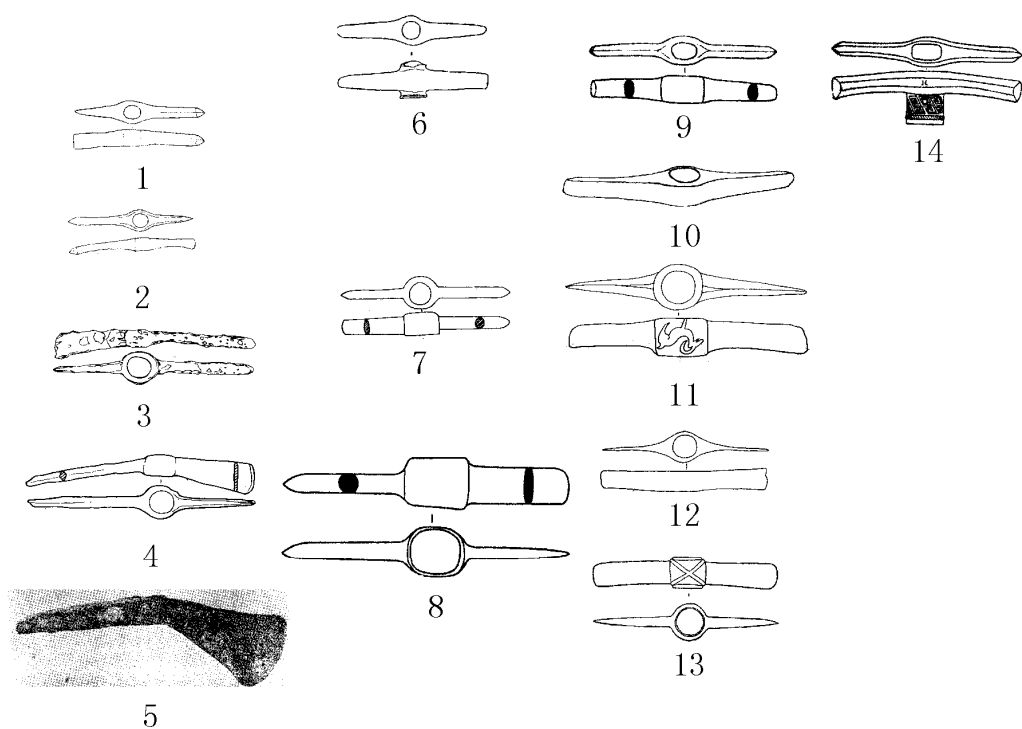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e crane-mouth-axe is a typical kind of bronze implements in northern China. But in fact, it contains some 6 different types of particular implements, i.e. double-edged axe, double-head-axe, hammer-axe, double-head-chisel and pickaxe. None of these 6 types of implements shared similar prevalent stage or origin,

Keywords: crane-mouth-axe ; type; date; orig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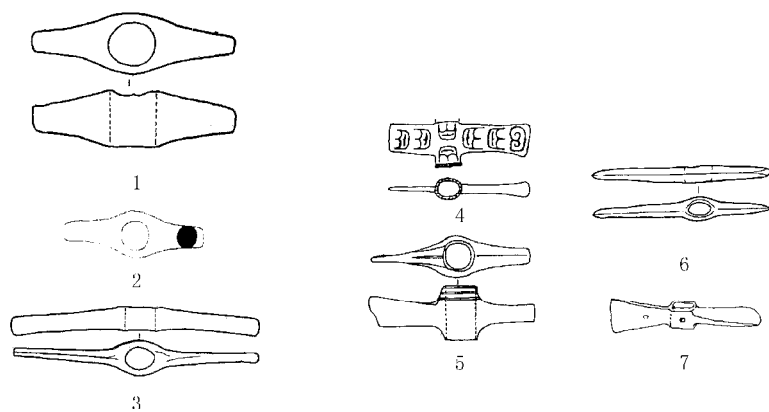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03-07-16

作者简介: 张文立(1967-), 男, 陕西西安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读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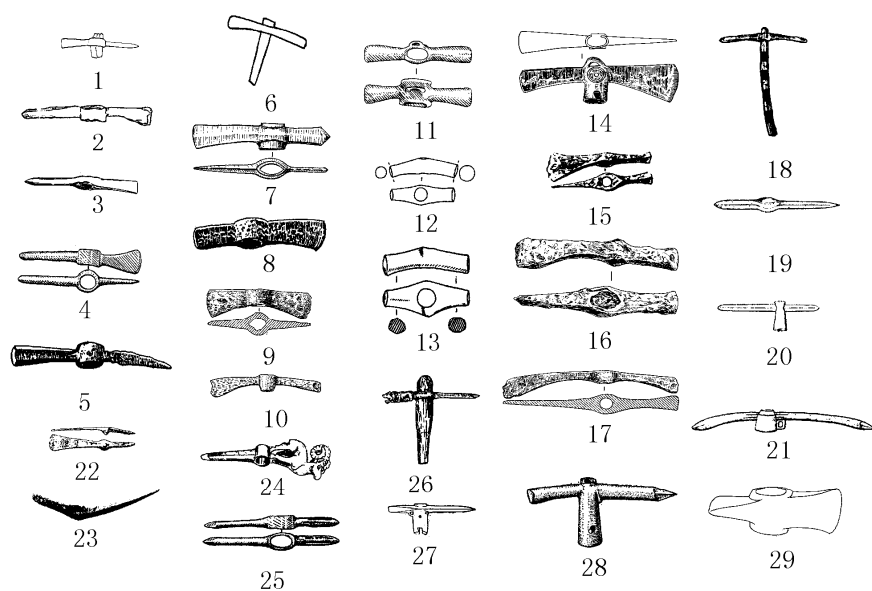
图一 鹤嘴斧与双刃斧

1—5. Aa型I—V式（公苏壕M1：1、呼鲁斯太M2：1、毛庆沟M38：1、玉隆太2264、西丰西岔沟）6—8. Ab型I—III式（固原马庄IM2：40庆阳红岩、彭阳白草洼）9—13. Ba型II—III式（彭阳白草洼、桃红巴拉M1：2、庆阳庙、彭阳古城村、固原马庄IM14：12）14. Bb型（风翔横水）（除3—4系铁制外，其余均系铜制）



图二 双头锤、锤斧、双头啄、镐和管銎斧

1—3. C型I—III式 (鄂 M224: 、固原马庄TM6: 21、鄂 TM243) 5. Da型、Db型 (扶风庄白、鄂E) 6. E型 (彭阳苑麻村) 7. F型 (宁城南山根M101出)



图三 境外出土的“鹤嘴斧”及相关器物举例

1、6. 乌兰若木 2、4、7、11、25. 图瓦地区 3. 西伯利亚 5、8、10、14、16. 高加索地区 9、17. 中欧地区 12、13. 东欧草原地带 15. 黑海北岸地区（沃勒科夫茨） 18、26、28. 阿尔泰地区 19、20、21. 米努辛斯克盆地 22. 中亚地区（达尔沃站遗址） 23、29. 西亚地区 24、27. 森林草原塔加尔文化（其中5、8—10，14—17. 系铁质其余均系铜质）